

Anti-Mimesis from Plato to Hitchcock

反摹仿论：
从柏拉图到希区柯克

汤姆·科恩著

Tom Cohe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AMBRIDGE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出品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外国文学研究文库

*Anti-Mimesis
from Plato to Hitchcock*

反摹仿论：
从柏拉图到希区柯克

汤姆·科恩著
Tom Cohen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京权图字：01-2018-4541

This is a reprint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ti-Mimesis from Plato to Hitchcock
9780521465847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This reprint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18

This reprint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reprint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摹仿论 : 从柏拉图到希区柯克 = Anti-Mimesis from Plato to Hitchcock :
英文 / (美) 汤姆·科恩 (Tom Cohen) 著. -- 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6

(外国文学研究文库)

ISBN 978-7-5213-0108-3

I . ①反… II . ①汤… III . ①外国文学－文学评论－英文 IV .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7927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项目负责 姚 虹 徐 宁

责任编辑 都楠楠

责任校对 徐 宁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 980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13-0108-3

定 价 46.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301080001

| 编委会

主 编 金 莉

委 员 (按姓氏拼音排列)

车 琳 陈众议 程 虹
丁 超 高峰枫 姜 红
蒋洪新 金惠敏 刘亚丁
穆宏燕 乔国强 申 丹
史忠义 汪民安 王邦维
王炳钧 王丽亚 王 宁
王 炎 魏育青 薛庆国
杨金才 于 雷 张建华
张龙妹 张隆溪 张中载
赵 刚 赵国新 郑书九

引介，将采用购买原作版权、组织国内该领域有影响的学者撰写导读的方式进行。这些导读将有助于读者把握作品的脉络，掌握其思想要点，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作品要义。鉴于英语之外其他语种作品的受众问题，除以英语撰写的著作以原文的形式出版之外，我们拟将其他语种的国外学者著作翻译成汉语，并附以专家导读。该“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系列丛书，我们将陆续推出国外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内容范围包括以下四个方向：外国文学理论、外国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理论与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研究。

北京外国语大学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邀请到了我国重要学者参加编委会，推荐挑选国外学界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著作。国内这一领域的资深学者将为著作撰写导读，并为非英语著作确定译者。我们希望通过这套“文库”，为拓展和深化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为帮助我国外国文学学者拓宽批评视野、开拓研究思路，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这套“文库”的出版，得到了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众多学者的鼎力相助和大力支持，也得到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全力配合，特此表示衷心感谢！

金莉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王佐良外国文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2018年4月18日

导 读

汤姆·科恩的《反摹仿论：从柏拉图到希区柯克》提出了位于西方传统中的文本语言的物质性（materiality）问题。不同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科恩要张举的是“语言唯物主义”。如果说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世界上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科恩的观点则是文本的本质是语言，先有语言，语言决定文本，文本是语言的反映。语言的“物质性”这一观点是本著的基石。这个“物质性”并非一个包括文本事件（textual event）的唯物历史主义的叙述，而是文本事件的实际性（facticity）¹ 通过刻写（inscription）、声音、字母和其他形象等“前喻指主体”（pre-figural signifying agent）

¹ 实际性（facticity）这个词来源于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开篇写道：“实际性是用来表示‘我们的’、‘本己的’此在的存在特征。”此在总是已经在世，这绝不是从某个更一般的前提推演出来的，而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实际处境，并且构成了任何哲学思考的起点。（海德格尔：《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何卫平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页。）

被主题化的方式。与文化唯物主义类似，语言唯物主义相信语言，因着其物质性，不仅仅具有精神性，也具有实践性，也同样参与了社会活动和结构的生成模式。可以说，这是一本形式主义（formalist）的著作，不过这里的“形式”并不是指脱离了主体经验和社会变化的形式，而是指在阅读和写作自身的历史中积极的变革主体的形式。

本书写于20世纪90年代。彼时正是摹仿论大张旗鼓之时，其表现形式是以身份政治、新历史主义等为特征的美国文化研究的各种范式。反摹仿论的出现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当时文本的核心地位被各种社会政治的公开路演所取代，解构主义也成了明日黄花。科恩指出，“文化研究”转向导致了对于摹仿主义和经验生活的文化主义意识形态的回归。在文化研究的概念版图里，文化不再是如利维斯所谓的高高在上的人类所思所言之精华，相反，文化是普通的，是全部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指意实践。这是导致了科恩所言的经验生活的文化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在科恩看来，在需要思考记忆的物质性及其变化技术，以及当时已经开始出现的气候变化问题的时代，这种回归是一种倒退。¹这部写于理论火热的时代的著作很注重“细读”，希望通过深入的细读探讨经典文本如何通过对事件的书写参与到对事件的制造之中，从而改变历史，引发相应的阐释反应。当然，这里的细读并非脱离政治、社会行为的审美活动，而是一种把这些因素集中起来的启蒙性阅读行为。科恩使用了“过分细读”(too close reading)的说法。“过分”(too)在此当然是反讽的(ironic)用法，意在讥讽当时的泛文化研究对文学外部文本的关注过多，因而忽视了文本自身。科恩的细读聚焦在文本语言的“前喻指主体”，重点探讨这些内含在语言深处的物质性因素如何参与历史的制造，并影响阐

¹ 科恩教授给本文作者的邮件中所述。

释的模式。《反摹仿论》为我们呈现的是一系列关于阅读的阅读。老实说，此书读起来是颇具挑战性的，卡萨里诺就认为本书的风格是德里达和德勒兹风格的交汇，是后德曼式的。¹ 读者诸君可能已经发现，这篇导读的文字也稍显晦涩，就算不是导读作者有意为之，也有着呼应科恩此著风格的潜意识吧。

《反摹仿论：从柏拉图到希区柯克》的标题是一个宣言。“反”似乎像一个介词一样无力，但实际上这个标题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奥尔巴赫那著名的经典之作《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所提出的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早已成为西方文学史写作的经典模式。当然，奥尔巴赫之前，早在古希腊时代，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了艺术摹仿自然的观点，后来苏格拉底进而提出了艺术对人的性格、精神方面的特质、心理活动等的摹仿。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认为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而艺术摹仿现实世界，是影子的影子。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艺术是对于现实世界本质和规律的摹仿，因此艺术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超越真实，即诗比历史更加真实。当然摹仿论也不是没有被挑战过。卡西尔就认为艺术对现实摹仿现实世界的理论太过关注艺术对现实的依赖，忽视了创作主体的作用：如果摹仿是艺术真正的目的，那么显而易见，艺术家的自发性和创造力就是一种干扰性的因素而不是一种建设性的因素：它歪曲事物的样子而不是根据事物的真实性质去描绘它们。² 科恩的质疑不是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而是从文本的角度。为了论证“反摹仿”，他回到了柏拉图，提出或许“柏拉图主义”中关于“理念”的指代的历史是一种集体的误读，在作为理念的床和床之间回响着

¹ Casarino, Cesare. *American Literature*. 1 September 1995, Vol 67(3). p. 620-621.

² Cassirer, Ernst.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Vol 1: Language*. Trans. Ralph Manheim.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187.

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对“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批判的观点。¹也就是说，柏拉图的作为理念的床和床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对主义的，或许只有关于床的相关性的理念，作为绝对理念的床或许并不存在。从柏拉图到希区柯克，即电影写作，暗示着这段历史直抵了今天的电子读图时代。这个历史的弧线显示了从印刷时代到电子时代的历程，也包括今天被我们姑且命名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人类(Anthropos)时代。这是从柏拉图的洞穴到今天的多屏幕电影院的跨越。如果说洞穴中的人们看不到真理的话，多屏幕电影院离真理的距离恐怕是同样遥远。在科恩看来，摹仿的本质是一种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契约，旨在通过预定的阐释反思连接社群，这种传统的摹仿阐释的出现控制了文化的传播、经典化以及使用问题。作为一种反驳，反摹仿论强调通过对文本细节的关注和阅读，进而考察历史被塑造并返回读者的方式。反摹仿论指向了记忆技术所造成的核心问题，这也包括了当今电子技术和气候混乱时期的电子物质以及阅读的变化所引起的诸多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反摹仿论》预演了科恩后来的著述，比如《意识形态与刻写：本雅明、德曼及巴赫金之后的“文化研究”》(*Ideology and Inscription: "Cultural Studies" after Benjamin, de Man, and Bakhtin, 1998*)，以及其稍后论述电影、人类世及气候

¹ “我用‘相关性’指的是如下思想，即我们永远只能接近思维与存在的相关性，而从来不可能撇开相关项的一方去接近另一方。任何坚持这种意义上的相关性具有不可超越性的思想潮流，我都将称之为相关主义”。(Quentin Meillassoux. *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e*. Trans. Ray Brassier. New York: Continuum, 2008, p. 5.)这听起来有些抽象，在2007年的一次演讲中，梅亚苏作了更加简明扼要的阐释：相关主义基于一个简单而有力的论证，即，不给予X就没有X，不设定X就没有关于X的理论。也就是说，如果你谈论某物，那么你谈论的就是给予你的某物，由你设定的某物。

变化的著作。¹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科恩在本著中提到的“后人类主义者”与现在时髦的跨人类主义者、后人文主义及未来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对科恩而言，它意味着逃避了阐释机器的那些东西，其中意义像在工厂中一样被日复一日地操纵和内化，与此相应的法律制度等被虔诚地遵守。本著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它开启了西方文本中“细读”的新视野，甚至改变了我们对经典文本中内涵的裂缝的理解，也不在于作者如何娴熟地绕过德里达经由德曼召唤出另一个解构的幽灵。科恩所使用的是反解构的解构，这种方法与德里达所使用的修辞假设并不一样。比如，德曼会认为并不存在需要解构的“卢梭”，因为卢梭的写作，剥除了文化意识形态的文本事件通过将自身生产出来而把自己解构。科恩作为德曼的学生使用的正是德曼的这种方法。它的重要性在于，作者揭示出刻写的事件历史如何控制了阐释传统的概念棱镜，从而形成了关于文学的虚假“历史”，一个甚至不能现身的历史。这些在本雅明是“历史主义”，是认知的魔咒，不经意间就封锁了未来的政治，阻挡了摹仿和指涉中的共同想象。这恐怕与现在的人们各自在智能手机屏幕上构造的微观世界并无不同。

在90年代的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身份政治的叙事中，反摹仿论反其道而行之，返回文本自身，在文本系统的微观区域里，从柏拉图，经由构成美国主义身份的经典文本（实用主义哲学、爱伦·坡、惠特曼、梅尔维尔、迪金森），通过对它们的细读，去寻找其中的刻写事件，再现一些经典的场景和误读，

1 科恩教授的电影著作包括两卷本的《希区柯克的假名》(*Hitchcock's Cryptonymies*, 2005)，近年科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气候变化批判理论，在所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创设了“气候变化批判理论研究院”(*Institute for Critical Climate Change*)，并在开放人文出版社(Open Humanities Press)主编“气候变化批判”(*Critical Climate Change*)和“气候混乱批判：无路可回”(*Critical Climate Chaos: Irreversibility*)系列丛书，已经出版丛书17本，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专著《末路演发：气候变化时代的理论》(*Telemorphosis: Theory in the Era of Climate Change*, 2012)。

探究它们如何造成了今日的人类世文化以及日渐加速的生态灾难现象。科恩近年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气候变化的文学结构，其考察的一个核心就是把刻写的物质性与媒介控制的后真理、后石油时代中生命系统的无机和反有机结合起来，搜寻其中阐释和指涉的痕迹。科恩拆解历史事件的索引的阅读不仅体现在对经典美国主义文本的细读之上，也包括了对柏拉图、巴赫金的阅读的阅读，当然，如本书标题所示，还有希区柯克。众所周知，柏拉图是西方形而上学思想的文本起点，柏拉图主义甚至被神话为教条，后经奥古斯丁为基督教所借用。科恩通过解读《普罗泰戈拉》中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修辞游戏的对话文本颠覆了这种普遍的看法。通过对这个对话中的对话的解读，一个多元的柏拉图被创造了（抑或涂抹了）出来。它是对这样的“对话”的一种反思，一个在被移置的舞台上的阅读场景中的发现。在对普罗泰戈拉的阅读中，柏拉图早已识破了德里达在《明信片》中把苏格拉底标为大写的“S”、柏拉图标为小写的“p”的用意，颠覆了他们之间的优先性、亲缘性、时序性。在巴赫金的例子中，“对话”的作用经由对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的物质主义解读来分享，纠正了惯常对巴赫金的“对话”的翻译，即差异之中的人的理解，一种阐释学的融合。科恩把巴赫金的“对话”——如同与他的签名相关的生产——返回到刻写、转化及记忆技术的顺序中。希区柯克作为“电影”的签名生产出了摹仿电影的对立面：摄影的意识形态及模拟技术早已把这些与书写竞争的媒介固定化或降级了。希区柯克常常把母国自身包含在摹仿的意识形态里面，比如在《39级台阶》中，把电影的、颠覆的、爆炸的、武力的因素和设计与电影（希区柯克）自身同一化。在希区柯克那里，电影写作机器的物质性，充分反映在伴随着电影的机械记忆的形式上，这在开场的舞台上是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表现在机器人似的“记忆先生”所代表和摹仿的记录及早前的刻写中。

在作者看来，这些阅读都旨在返回到这些作品的原点，力图将它们曾被遮蔽、主题化和挪用化的解释重新彰显给读者。在意识形态的指涉被确定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是刻写，与其说这些刻写确证了那些解释的传统，不如说它可以阻止参与其中的观念的形成。科恩所强调的“人文主义”阅读并不是要强调历史生活和情感的有限性，而是要揭示被挪用扭曲的阐释的封闭空间。对于美国经典文献的阅读抨击了这些文本所扮演的身份认同意识形态。如果柏拉图是个跳板，借此“理念”（与文本所表现的相反），一种符合民族主义经典的美国例外论的想象，一个受伤的经典，通过大规模的涂抹和对经典的整体性重读，比如爱伦·坡、梅尔维尔、实用主义意识形态、惠特曼的形象等等，每一部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经由涂抹把最初的不可还原的文本的物质性进行置换。康拉德在本书中的出现看似随意，却通过质疑刚果的黑暗领地引领我们思考意向式的解读如何规定了阐释的历史。科恩对一个更加物质化的阅读的呼吁是为了祛魅一个约定俗成的对经典文本的假设，这样的阅读可以被延伸到今天的语境。“阅读”所发生的场域是一个历史记忆的战场、感觉的生发器，以及意义的源泉。

在21世纪的今天，阅读行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电子阅读的各种模式正在重组着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阅读行为也正成为一个集中的跳板，其中人类的阐释防御机制以及被本雅明称为全人主体(all-human agency)的语言正在被燃烧殆尽，各种表情包和层出不穷的新名词等经由各种电子市场上的软件和福克斯新闻之类的媒体，通过不断的重复灌输给我们，仿佛荧屏文化的云雾，用图像的形式强化一种乏味的摹仿。科恩所提出的通过细读返回刻写的“物质性”是一条“单行道”(one-way street)，希望弥补文化研究、新实用主义等的理论缺憾。在今天这样一个人类世的时代，重新返回经典文本的刻写方式，发掘导致今日气候乱象、恐怖主义、媒介迷乱的物质性因素，可能是人文学者所要担当的责

任，这也是科恩教授后期著作的重点所在。在今天这个充斥着“替代性事实”(alternative facts)、“后真相”(post-truth)等话语壁画的媒介时代，“修辞阅读”的训练将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故事背后的逻辑。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曾举过一个这样的例子：美国NBC的晚间新闻每晚结束的时候都有一个“爱心带来改变”的节目。最近的一个节目介绍了一个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家庭，这个家庭每个月寄给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家庭2000美元，因为后者家里的“顶梁柱”失了业。现在该家庭还在帮助亚拉巴马州的这位爸爸寻找工作。谁会不羡慕得州家庭的善举和他们的人道的同情心呢？但是，米勒提醒我们，这其中隐含有政治信息，每天都有这类不断翻新的故事日复一日地被灌输给我们，即是说，美国不需要对富人和大型机构增税，不需要刺激联邦政府的花费以便创造工作机会、普遍的健康医疗等，因为总会有得克萨斯州或其他地方的家庭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¹米勒此例告诉我们，运用科恩本著中所示的细读方式走入这些叙事景观背后的刻写实践，将不仅是文学的操演，同样也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周 敏
上海外国语大学

¹ 转引自希利斯·米勒：《J.希利斯·米勒文集》，王逢振、周敏编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For "Mallie," goddess

"How good are the copies?"

"Almost perfect."

"Then why do you want the originals? Collector's vanity."

"Changes, Mr. Snide, can only be effected by alterations in the *original*. The only thing not prerecorded in a prerecorded universe are the prerecordings themselves. The copies can only repeat themselves word for word. *A virus is a copy.* You can pretty it up, cut it up, scramble it – it will reassemble in the same form. Without being an idealist, I am reluctant to see the originals in the hands of the Countess de Gulpa, the Countess de Vile and the pickle factory ..."

William Burroughs, *Cities of the Red Night*

How might one free oneself from the cowardliness pressing upon social convictions of the present, subjugated as they are to reactive, mimetic, and regressive posturings?

Avital Ronell, *Crack Wars*

Acknowledgments

The volume owes a number of debts that are difficult to trace. Of the ones that are apparent, I am particularly grateful to J. Hillis Miller as a reader whose clarity and support have been essential to me. In diverse ways, I want to thank: James Thompson and Trudier Harris for their friendship and intelligence; Johanna Prins for the timely gift of her company and critical brilliance; Betsy Dillon and Sarah Pelmas for their insightful response to earlier versions of the Hitchcock chapter; Christopher Diffee for his help and critical acumen; and William Schouppe for his helpful comments. In a special category, I want to thank Barbara Herrnstein Smith, whose generous criticism was decisive to the final form of at least one chapter. I also thank Tom Hadju and Andy Milburn for the stimulus of their rare energies, Michael Sprinker for his support and advice, and Dan Myerson for being himself. Finally, I am grateful to Professor Joseph Flora of the UNC English Department, Professor Ruel Tyson, and the Institute for the Arts and Humanities at UNC Chapel Hill for securing for me leave for this work.

Three of the chapters have appeared whole or in part previously: chapter five in *Arizona Quarterly* (Summer, 1993 [copyright of the Arizona Board of Regents]), chapter seven in *Rereading the New: A Backward Glance at Modernism*, edited by Kevin Dettma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2), and chapter nine in *Qui Parle* (Fall, 1993), and I gratefully acknowledge permission to reprint.